

文化与学术: 异邦的新声及启示

——“汉译俄罗斯学术丛书”总序

● 程金城

(兰州大学 中文系, 甘肃 兰州 730000)

〔内容提要〕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 中国学术界对俄苏文化怀有复杂的感情; 当前俄罗斯文化对中国影响力相对减弱有其必然性。但俄罗斯仍有其它西方国家不能替代的独特文化传统和学术精神, 应成为中国重新建构文化理论体系 和进行学术研究的重要参照系。作者结合对将由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的 三部汉译俄罗斯文化学著作的特点的分析, 认为 其所体现出的“问题意识”、“关联意识”、“多元意识”、“创化意识”和“自省意识”等学术精神, 可以作为中国学者的借鉴。

〔关键词〕 俄罗斯; 文化; 学术精神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 3637(2004)01- 0041- 03

对于俄罗斯文化与学术, 中国人、特别是中国文化界和学术界, 怀有一种特殊、复杂而矛盾的感情。

近百年来, 俄苏文化作为“异邦”的“新声”, 不仅直接地、强烈地影响过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和精神信仰, 影响过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情感倾向, 而且间接地但却同样深刻地影响过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度和经济模式, 甚至影响过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态度。中国人从中汲取的巨大教益和吸取的深刻教训同样的刻骨铭心, 对俄罗斯文化的深厚情感与某种“谨慎”心理同时并存。

改革开放以后, 中国人在对自身进行反思的时候, 也对包括俄苏在内的外来文化思想在中国的作用进行了反思, 由此得出的结论和产生的情感可以说异常复杂。虽然, 人们不会简单地把自己走过的弯路归于某种外来文化, 但不同领域的人们在检讨曾经照搬苏联模式带来的严重后果的时候, 却有着不可名状的矛盾心理情绪, 在客观上将“面向世界”的视线主要转向了欧美, 俄苏文化一度自觉不自觉地被淡漠或者淡化。苏联的解体加剧了这种现象。诚然, 这可以从正面理解为由“独尊”一种外来文化向容纳“多元”文化的正常转变, 而且在此其间仍然有不少俄罗斯的哲学、宗教学、美学、文学艺术、心理学等方面著作的译介, 俄罗斯汉学家的成就也令中国学者钦佩; 但是, 毋须讳言, 与西方文化思想在当代中国的情景相比, 俄罗斯文化思想的整体影响力明显减弱。指出这一现象, 并不是要恢复俄罗斯文化在中国昔日的“辉煌”地位, 而是认为, 具有悠久历史和深厚底蕴的俄罗斯文化, 仍然应该成为欧美等西方文化之外的另一重要参照体系。优秀的文化是可以超越时空局限的, 它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在重新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理论体系和价值系统的过程中, 多一种参照就多一种借鉴, 多一种视觉, 多一种思维方式。

俄罗斯文化作为一种参照体系之于中国, 是其它西方文化不能替代的。这除了俄罗斯文化自身的特质及其研究成果和学术思想的借鉴意义外, 俄罗斯学者所体现出的研究方法、思维方式, 特别是在苏联解体后的研究思路、话语体系的转变, 对于曾经深受其影响的中国文化和学术界有特殊的意义。“解铃还得系铃人”, 从一定意义上说, 俄罗斯文化和学

术思想的变化可以为中国学者理智地调整和建立自己的学术规范提供独特的启示。因为中国曾经有过与俄罗斯相似的社会变革过程, 有过相同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模式, 在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方面有过相似的思想体系、话语系统、思维方式, 甚至在概念术语和表达方式上也有过深刻的关联。俄罗斯文化对中国的影响曾经是深层的广泛的。那么, 在世界形势发生巨变之后, 在各种文化观念日益多元、文化冲突日益激烈的当代, 在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 学者的学术思想有何变化? 他们对自己有何种反省? 他们保留了哪些经验, 扬弃了哪些观念和方法? 目前他们在关注什么问题? 他们的优势在哪里? 中国学者不仅渴望了解俄罗斯文化的新成果, 也特别希望了解近年来俄罗斯学术思想的变化。正是在这种情势下, “汉译俄罗斯学术丛书”的出现具有了特殊的意义。它是一扇新的窗口, 透过这扇窗口, 我们可以窥一斑而略知全豹, 具体地了解新近俄罗斯文化和学术研究的一些状况。而按组织者和译者的设想, 丛书将不定期地选译俄罗斯各种新的学术著作, 逐步形成有特色的开放的系列译丛, 搭起中俄学术界交流的桥梁。

先期翻译出版的是“文化学”研究方面的三本著作: B·德拉奇的《世界文化百题》、安娜·尼古拉耶夫娜·马尔科娃的《文化学》、叶列纳·米纳伊罗夫纳·斯科瓦尔佐娃的《文化理论与俄罗斯文化史》。它们都是近年来在俄罗斯有重要影响的文化学著作, 其中两部是俄罗斯联邦教育部推荐的高校使用教材。

我们知道, “文化”是使用最多最广的一个术语, “文化”也是最难以界定的概念, 据说其定义已多达数百种。虽然将文化作为一个学科来研究的时间并不长, 但是, 多角度、多层面、多种背景下的文化理论却已经异常纷繁复杂, 众说纷纭, 莫衷一是。在我国, 新时期以来, 与“文化”相关的各种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一直是热点, 而冠以“文化”的事物也越来越多。诸如“文化人类学”、“文化诗学”、“文化批判”、“文化批评”、“文化冲突”、“比较文化”、“审美文化”等学科领域、概念术语和研究方法已耳熟能详; 诸如“通俗文化”、“大众文化”、“民间文化”、“服饰文化”、“饮食文化”、“旅游文化”、“景观文化”、“企业文化”、“网络文化”等已经成为社会生活中的约定

俗成的称谓;诸如“神秘文化”、“禁忌文化”、“性文化”、“宗教文化”、“少数民族文化”、“另类文化”等也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重要对象;而诸如“龙文化”、“酒文化”、“茶文化”、“石文化”、“竹文化”、“烟草文化”、“豆腐文化”、“咖啡文化”等等更为具体的“文化”概念也层出不穷。可以说,从形而上到形而下,从物质到精神,从广义到狭义,“文化”无所不在,包罗万象。这种“泛文化”现象为文化学学科提出一系列问题:究竟什么是文化?什么是文化的内涵与外延?什么是文化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文化学主要有那些概念和范畴?文化是如何生成又如何演变的?文化有什么功能?等等。面对这些最基本的问题,国内的研究成果和译介的外国的研究成果都已不少,成绩不可小视。但同时,却似乎有使理论问题越来越复杂之感,论述越多越难以把握。因此,不管是专业研究者,还是普通读者,都希望有定义确切、简明扼要的文化学的著作答疑解惑。而正是在这方面,俄罗斯学者的著作显示出其特点和专长。

这三部著作自成体系又相互关联,史论结合而浅显易懂,不仅内容新颖,而且体例独特,便于掌握和理解。不管是作为教材,还是作为文化学的普及读物和研究参考,都是非常适用的。而最值得中国学者借鉴的,我以为是体现在著作中的俄罗斯学术精神和作者的自觉意识。我将其归纳为:

一、“问题意识”。将文化学方面的基本问题、重要问题、难点问题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并由此展开来设置体例,是三部著作的共同特点。《世界文化百题》首先从最需要了解的文化理论、流派、体系等基本问题入手,以具体问题为知识点,逐一阐述。其中如对文化的“通常概念和理论概念的区别”,就是文化学最需要弄清的难点和疑点。接下来对“文化本体论”的阐述也突出的是重点问题。之后的几章则是对世界文化的实证的具体的介绍。《文化理论与俄罗斯文化史》第一编是对文化的本质、文化理论、文化的结构、精神文化、文化动力说、文化研究对象等的系统论述,并附有“文化理论术语小词典”,系统而实用。第二编是对俄罗斯文化发展历史的清晰描述,也以文化现象和问题的解释为重点。《文化学》则从文化学的本质及其基本功能谈起,然后以纵向时间为线索,介绍文化历史,而突出的仍然是各种文化“问题”。特别重要的是都不回避现实文化问题,对文化史的概述和理论的把握始终注重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事实与理论的密切联系。比如对1917年“十月革命”以来俄苏文化现象和文化历史演变的描述,包括对苏联历史中带有悲剧性的文化现象和社会重大变革后的文化问题的阐述,都作为重要问题研究。而对“俄罗斯文化领域中的现代情势评述”“在当代俄罗斯文化中,‘文化间隔’和‘后现代派’概念的对比”,“在具有游离社会概念的文化模式更替时代人们的品行类型”等等(《世界文化百题》),都体现出文化学研究的当代性和“问题”意识。这种着眼于对“问题”的发现和解决的意识,避免了抽象空泛的理论,简明扼要、言简意赅而又触及现实,值得借鉴。

二、“关联意识”。文化学是一个联系不同时空、辐射多种领域、触及多种层面的复杂体系,任何单一的或者片面的

角度都难以解释它的特质。它既需要从时间的连续性上去阐述其发生发展,也需要从空间的不同形态进行综合研究和比较研究,历时态的线索勾勒与共时态的层次分析都是不可或缺的。而狭义文化与国体、政权、制度等上层建筑,与哲学、宗教、科学、伦理道德、文学艺术等意识形态的复杂关系,更是应该充分注意的。可以说,对关联性的注重和把握,是解开文化理论问题症结的重要途径。正是认识到“文化是一个异常复杂的多层面体系”,注重到文化复杂的关联性,也才会对研究对象有“层次”和“结构”的理性意识,而不仅仅是“文化”概念的解释。比如,“根据载体的不同”。将文化分为“世界文化、社会总体文化、家族文化和人的个人文化等”。(《文化理论与俄罗斯文化史》)即为一例。而对哲学的文化观、神学的文化观、宗教的文化观的介绍,对文化与科学、文化与文学艺术等等关系的探讨,也体现着这种关联意识。不是就文化论文化,而是在关系中讲文化,其所体现的整体意识、关系意识和辩证观点,与一些西方论著有明显不同,从中似乎可以体会出现代俄苏文化背景和思维特点的承传。

三、“多元意识”。文化问题的复杂性、多维性决定了其具有多种解释的可能性,因此,关于文化问题的各种理论的繁复和冲突就不可避免。换句话说,不能指望执着于一种文化理论来构建文化学学科和解释文化现象,而应该是多元基础上的共识。在这三部著作中,有些论题有交叉,但在具体内容上却不重复,这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对同一问题的阐述时,各自都特别注意从不同角度介绍和吸纳各种不同文化背景下学者的观点,比如,《文化理论与俄罗斯文化史》围绕文化概念,列举了从普芬道夫、维科、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爱尔维修、卢梭等一直到20世纪重要理论家思想家关于文化的各种观点;《世界文化百题》关于文化理论问题,在集中介绍了现代人类学等主要流派之后,特别对施本格勒、阿尔弗勒德·维贝尔、马克斯·维贝尔、胡塞尔、雅斯贝斯、荣格、施韦泽,以及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等不同文化思想做了介绍和评介。这为读者了解这一学科领域的全貌提供了丰富的线索,体现一种宽容和多元的学术意识。兼收并蓄,反对独断,在客观介绍各种不同观点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学术观点并引导读者自己做出判断,这不仅对于教材编写十分必要,而且对于一般学术研究也至关重要。

四、“创化意识”。不是照搬理论,而是在阐述理论问题时融入自己的思考,并运用于实际问题的研究,也是给人留下深刻影响的特点。比如《世界文化百题》有不少篇幅论述俄罗斯文化原型,其理论基础是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原型概念,作者在运用这一理论对俄罗斯文化特点进行分析时的创造性发挥,使人耳目一新。比如,关于“地缘政治因素对俄罗斯文化原始形态形成的影响”,“地理环境对俄罗斯文化原始形态形成的影响”,“在俄罗斯文化的原型中起主导作用的社会理念”,“俄罗斯的国体和文化原型之间的联系”,“在俄罗斯文化原型中,对良心、责任、自由、公正之类价值的阐述”,“在俄罗斯文化原型中,对国家、政权、制度、权威、劳动等概念的解释”等等,用原型理论观点和原型分析方法令人信服地解释了俄罗斯文化和民族性格中的 (下转第40页)

都,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其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风谣歌舞,各附其俗;魁梧长者,莫非其旧。何哉?发言为诗者,咏其所志也;升高能赋者,颂其所见也。美物者贵依其本,赞事者宜本其实。匪本匪实,览者奚信?”指出赋体创作不仅应具备“博物”的特征,而且应遵循“征实”的原则。

从这种粗略的分析中,不难形成两种看法:(一)两篇《三都赋序》表现出的文学思想差异甚大,可见绝非出自一人之手。也就是说,署名皇甫谧的《三都赋序》不可能为左思伪撰;(二)皇甫谧序提出的“美丽之文,赋之作也”、“欲人不能加也”的观点和左思序中赋体创作应遵循“博物”、“征实”原则的主张,共同驱使着左思不断对自己的作品进行修改,以期《三都赋》能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又一次证明了《三都赋》初稿撰成于太康二年(公元281年)的可靠,从另一个角度又表现出皇甫谧为《三都赋》初稿撰序的可能。

注 释:

- ①②见郁沅、张明高《魏晋南北朝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1月,第138、135页。
- ②见王运熙、杨明:《中国文学批评通史·魏晋南北朝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12月,第86页。
- ③⑦⑩⑬见《晋书·左思传》,中华书局,1974年11月,总第2376~2377页。
- ④⑬⑭见《世说新语》,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5月,第201、565、378页。
- ⑤⑥⑭见《文选》中华书局,1977年,第641~642、75页。
- ⑧⑨(16)见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8月,

第246~248页。

- ⑪见《晋书·陆机传》,中华书局,1974年11月,总第1476页;
- ⑫⑯见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7月,第696、804页。
- ⑬左思:《咏史》,见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9月,第732页。
- ⑮见裴松之:《三国志注》,中华书局,第649页。
- ⑯严可均:《全晋文》(卷一百〇五)《三都赋略解注》,转引自《魏晋南北朝文论选》第141页。
- ⑰见王士禛:《古夫于亭杂录》,中华书局,1997年12月,第60页。
- ⑱严可均:《全晋文》(卷一百四十六)《左思别传注》,转引自《中古文学系年》第804页。
- ⑲朱东润:《陆机年表》,载于《武大文哲季刊》1930年1卷1~2期。
- ⑳裴松之:《三国志》注引张隐《文士传》,转引自《中古文学系年》第797页。
- ㉑见《晋书·后妃传》,中华书局,1974年11月,总第957页。
- ㉒见《晋书·皇甫谧传》,中华书局,1974年11月,总1409~1418页。
- ㉓皇甫谧:《南都赋注》,见吴士鉴《补晋书经籍志》卷四,转引自《中古文学系年》第700页。
- ㉔⑭见《魏晋南北朝文论选》第136、133页。
- ㉕见《鲁迅全集》第三卷《魏晋风度及与药及酒之关系》第379页。
- ㉖⑳见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3月,第86、85页。

责任编辑:汉河;校对:竹君

(上接第42页)深层问题。我们知道,现代原型理论多被运用于神话学、心理学、文学艺术等领域的研究,而将它运用于广义的文化研究,并能深刻地分析深层的文化精神现象,无疑是对理论的创造性发挥,而在一定意义上又是对原型理论本身的一种发展。

五、“自省意识”。文化学研究的目的最终是为了更好地认识人和世界,认识自我,解释各种难以解释的社会文化和精神现象,换句话说,它的实践意义在于重新“认识你自己”,认识自己的民族,认识自己生存的这个世界及其历史。作为俄罗斯联邦高校推荐教材,三部著作都有不少篇幅介绍俄罗斯文化特质和文化史,字里行间有意无意地体现出俄罗斯国家和民族意识。但是,这却并不是狭隘的民族和国家意识,而体现着人类意识,这种意识我以为是指向人类的民族自省和自信的意识。比如,在论及俄罗斯文化原型的基本价值时,对俄罗斯文化和民族性格的剖析就很深刻:“在俄罗斯文化原型中形成这样一种责任模式,一个人责任的目标不是结果,而是活动的范例。因此,俄国人的责任乃是无意识地奉公守法,并且绝对执行他人的指令。因此可见,在俄罗斯文化原型中责任是活动的内在范式,而监督责任的方式是严格遵守外部的指令,而且有一种一旦偏离活动的标准就要受到惩处的恐惧感。”(《世界文化百题》243)在阐述“俄罗斯文化的两重性和双重感情”时,认为“……俄国人民的民族性格中,完全对立的特征交织在一起:善良与残忍、真诚与无理、

利他主义与利己主义、妄自菲薄与自高自大、爱好自由与专横霸道、谦虚与冲动、国家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世界文化百题》250页)。“俄罗斯的两重性是不稳定性和多变性、变异性和逆转性的根源,它造成了俄罗斯文化发展的非连续性和灾难性后果,使其一直竭力通过“爆发”的方式、利用剧烈而坚决的新的(往往是出乎以外的)质变来摆脱双重束缚”(《世界文化百题》250页)。在这些论述中,体现着深刻的自我洞察、自省与自信,与那种狭隘的民族情绪和浅薄的“爱国”意识判然有别,表现出特有的学术风格和科学精神。这种意识和精神还表现在对诸如斯大林时期、苏联的解体等复杂问题阐述时的客观性与科学性上,不回避问题的尖锐性,也不是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这是一种学术规范,也是学术精神和学者的风度。

自然,由于三部著作带有普及文化学知识的特点,与纯粹的理论专著有别,理论深度并非其特长。然而这并不影响其价值。

人是创造文化的动物,有人存在就有文化,但文化学却还是新兴的有待发展的学科,此领域的任何学术成果都不能穷尽真理而是在向真理接近,在这过程中,中国学者对于其他国家、民族的学术成果和方法途径的借鉴,对于向文化学学科真理的接近无疑大有裨益。

*“汉译俄罗斯学术丛书”近期由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

责任编辑:汉和;校对:竹君